



格致经济史译丛

信贷立国

疆域、权力 与欧洲政体的发展

[美] 戴维·斯塔萨维奇 著
席天扬 欧恺 译

States of Credit
Size,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Polities

格致经济史译丛

信贷立国

疆域、权力 与欧洲政体的发展

[美] 戴维·斯塔萨维奇 著
席天扬 欧恺 译

States of Credit
Size,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Polit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贷立国:疆域、权力与欧洲政体的发展/(美)
斯塔萨维奇著;席天扬,欧恺译.—上海:格致出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格致经济史译丛)

ISBN 978-7-5432-2577-0

I. ①信… II. ①斯… ②席… ③欧… III. ①政治制
度史-研究-欧洲 IV. ①D7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7108 号

责任编辑 王 萌
美术编辑 路 静

信贷立国——疆域、权力与欧洲政体的发展

[美]戴维·斯塔萨维奇 著 席天扬 欧恺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格致出版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1
字 数 171,000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译者序

本书是着眼于早期现代欧洲政治经济史来探讨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一本力作。在这本 200 页左右的专著中，戴维·斯塔萨维奇教授试图通过一个简洁的理论框架来回答当代制度经济学中悬而未决的难题：为什么相似制度下的经济成长会有大相径庭的结果？政治制度促进国家强大和繁荣的条件是什么？

此处所指的政治制度，是公元 1250—1750 年凡 500 年间欧洲政体的代议机构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考察重点在于其审议、监督和控制国家财政支出的功能。而与政治制度相联系的经济变量是国家信用能力，具体说，就是一国是否有能力发债、发行长期债，以及以较低的成本发债。基于对 500 年间公债和代议机构大量数据的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斯塔萨维奇教授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代议机构对于国家财政支出的有效控制，是建立国家信用的必要条件。第二，代议机构以财政控制为核心的政治权力能否运行有序，取决于政体中占优的政治力量能否从建立长期国家信用中受益，以及维持代议机构所需的成本。而前工业时代的维持制度成本又主要取决于地理因素：交通成本的存在，使得疆域大小成为代议制机构发挥对财政的审议、监督功能的重要约束。简言之，500 年间兴衰系于制度，而对制度则要到更早的历史和地理空间中去找源头。

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对国家兴衰的论述一直存在两条路径：自

然地理主导论者和制度主导论者。地理主导论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让·博丹的经典论著，但通常认为系统理论滥觞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气候对于不同民族的体魄、性格、风俗，乃至法律和政治制度具有决定性影响；一国的疆域大小往往决定着政体形态——小国宜于共和制，而大国宜于君主制。在当代经济学和历史学界，亦不乏对地理因素主导经济发展说抱以同情乃至鼓吹的学者。J. 戴蒙德的名著《枪炮、病菌和钢铁》是晚近的例子，与之遥相呼应的是经济学家 J. 萨克斯关于经济发展与地理因素的大量实证研究。在人类历史中，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往往集中出现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很难说是一种巧合。

然而，地理因素主导论无法解释经济增长在时间上的波动，也难以说明具有相同的地理禀赋的地区在经济表现上的差距。从叙利亚到阿富汗，无数曾经辉煌的文明渐次凋敝于战乱。今天海地人均 GDP 只有 1000 多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属于穷国——然而海地在 19 世纪曾比美国富有，并在独立战争中大败英法联军。地理纬度相近的国家，今天的发展水平和公共治理能力往往也参差不齐——俄罗斯和加拿大，新加坡和同纬度上的非洲国家，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说地理对于增长仍然是重要的，我们就有必要把地理因素放到历史的长时段中去研究，考察地理因素如何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各种动力交互作用。

这样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主力军的制度论者，在对长时段的把握上走得更远。前不久逝世的经济学家，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生前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在 1973 年《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与合作者托马斯把工业化以来西欧国家的经济领先归结于制度，特别是以私人产权保护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和以分权制衡为原则的政治架构。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一系列专著和研究中，诺思及其合作者以交易费用概念为核心发展了一整套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共生演化的理论。该理论体系可以归结为两大命题：制度是增长的主

导因素；制度是内生的，取决于包括天气、地理在内的各种外在和偶发的因素。

不难看出，新制度经济学的两大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张力，常常对研究者形成某种挑战。如果制度是内生的——取决于一系列外在和偶发的因素——我们如何知道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制度本身，而不是影响制度的外在和偶发的因素？历史是否由偶然性决定？如果加勒比海上空的一群蝴蝶震动翅膀最终在佛罗里达引发了海啸，我们应该说是海啸造成了灾害损失，还是蝴蝶造成了灾害损失？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中，这个问题涉及因果识别，即如何从已有的数据和事实材料中令人确信地证明是事件本身，而不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造成了我们关心的结果。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除了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对案例和情境的分析提炼出一套在逻辑上自洽的理论解释，使得理论命题与计量分析一致。

以诺思和温加斯特研究英国 1688 年“光荣革命”后公债市场变化的经典论文为例。作者发现“光荣革命”之后公债的发行频率提高了，借债的成本——利率——下降了。这说明对信贷的供给增加了，手中握有资本的工商业阶层更愿意向王室放贷。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技术并没有革命性的突破，金融市场的结构也没有变化，为何公债市场的供给显著增加？诺思和温加斯特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爬梳证明：在“光荣革命”前，议会处在被压制的地位，无法对王室形成有效的制约。相应地，专权的王室在取得融资后存在着事后的道德风险，无法保证及时地偿还债务和保障贵族和商人阶层的财产安全。这反过来压抑了商人集团的放贷意愿，以及国家通过公债融资扩大经济活动规模和公共品提供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1688 年的“光荣革命”不啻一场为提升国家能力和经济繁荣而限制君权的“顶层设计”。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命题所概括的，制度保障是提升国家信用的重要前提。

然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特别是从制度内生性的第二个

基本命题出发，我们自然也可以对上述论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光荣革命”的产生是无条件吗？是否没有经历过“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比如共和制的城邦国家）必然缺乏举债能力？是否只要议会对王室形成有效的制约，就能孕育产生强大的国家信用能力和发达的公债市场，而无需其他社会、经济状况的前定条件？S.R. 爱泼斯坦基于更大范围欧洲国家的比较研究，提出英国的公债市场之于欧洲只是特例。公元1500—1700年300年间，英国政府为公债所支付的利率不仅高于意大利城邦国家，也高于大部分欧洲大陆的君主制国家。在光荣革命之后的1690年，王室仍然支付10%的短期利率，而此时荷兰共和国的利率是3%—3.75%，法国是5%，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地利是5%—6%。^[1]本书作者斯塔萨维奇通过对英国金融史数据的深入研究，于2007年在《欧洲经济史评论》上发表论文，指出在光荣革命的发生与公债利率的大幅下降之间有近30年的时滞。借贷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是倾向于发展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辉格党人赢得了1715年选举，在议会中确立政治主导权之后的事情。^[2]尽管有议会对王权做约束，但如果没有重视商业的政治力量做后盾，强大的国家信用能力亦是阙如。制度的作用不是无条件的。在这个案例中，议会对王室的约束既不构成国家信用能力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制度影响的研究，在理论框架上必须解决“造成制度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什么？”这一内生性问题。对历史制度的比较研究，无论其具体考察对象，往往处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两大基本命题的影响焦虑之下，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这两个命题。时至今日，可以说大多数涉及国家信用和财政能力的研究是在续写诺思和温加斯特“光荣革命”的故事。随着历史数据和案例资料的不断完善，对于代议机构在财政中的作用，学术界有了更为丰富和全面的理解。

回到本书所谈的问题，作者回溯到地理因素来解释欧洲早期现代

的代议制度，特别是城市国家和领土国家在代议功能上的异同，也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制度和发展互相影响的机制。历史上地理因素的演变虽然有偶然性的影响，人类社会对地理因素的反应——如城市的选址、国家疆域的大小、代议机构的组织形式——却不是由地理因素机械决定的。任何制度的出现，都是参与政治进程的各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基于自身的利益博弈的产物，是对当时的现实约束条件的反应。不理解这一点，就可能从“制度内生论”重新落入机械的“地理决定论”的窠臼，得出“城市国家优于领土国家”，“小国比大国更有利于监督政府、建立好的制度”，“政府越弱的制度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越有利”等等似是而非的结论。在斯塔萨维奇教授对城市国家和领土国家的比较研究中，他并没有标签化地把城市国家归结为约束行政权力、保障财产权的“好”制度，把领土国家简单地归为对君主缺乏约束的“坏”制度。特别在对城市国家的案例研究中，作者指出城市的商人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代议机构的把持，使得城市国家成为政治上代表寡头利益且封闭的体系，最终损害了商业活动和社会流动性，最终导致了国家信用能力的衰弱。

我们不难看出，斯塔萨维奇教授的研究方法是严谨的，而其结论是审慎克制的。正如作者所揭示的：制度不是一个单一概念，其影响涉及诸多不同的政策维度和利益相关方；对于什么是“好”制度不存在放诸四海皆准的结论。对城市商人阶层有利的，对农业部门可能不利；今天对发展有利的制度，明天就可能成为发展的束缚；在欧洲彼时有效的安排，在此时的美国可能引发混乱。全面理解政治制度的经济作用及其运作机制，避免标签式、卡通化的结论，可能是今天我们国内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论述中需要特别检讨的。

席天扬

2016年2月于北京大学

注 释

[1][美] S.R. 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 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彭凯翔校，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2] Stasavage, David, 2007, "Partisan Politics and Public Debt: The Importance of the 'Whig Supremacy' for Britain's Financial Revolutio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1, 123—153.

致谢

在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很多人都十分热心地提供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特别地，我要感谢 Daron Acemoglu、Neal Beck、Carles Boix、Deborah Boucoyannis、Mark Dincecco、Mauricio Drelichman、Jim Fearon、Jeff Frieden、Steve Haber、Pierre-Cyrille Hautcoeur、Susan Hyde、Margaret Levi、Bernard Manin、Abdul Noury、Jim Robinson、Ron Rogowski、Ken Scheve、Michael Sonenscher、Konstantin Sonin、Mike Tomz 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匿名审稿人。

我有幸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巴黎经济学院、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向研讨会的听众展示了这本书的手稿，他们都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回应和评论。我还有机会在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杜克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向听众展示了手稿的部分章节，他们也十分慷慨地提供了大量意见。此外，我在纽约大学政治系的同事们源源不断地向我提出洞见并给予我鼓励。同样我要对纽约大学 Chris Bowman、Sonke Ehret、James Hollyer、Sun Jeong Lee 和 Tolga Sinmazdemir 出色的研究助理工作表示感谢。

我要对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 Seth Ditchik、Chuck Myers 和 Janie Chan 在编辑与出版过程的每个阶段所给予的建议表示感谢。同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文字编辑 Linda Truilo 提供了大量建议使得最终的手稿增色不少。我特别感激丛书主编 Joel Mokyr，在我争取

打造一部阐发宏大学术争论的著作的每一步中，他都耐心地给我指引。

最后，我衷心感谢我的妻子 **Emmanuelle Ertel**，她在为自己的项目努力的同时，总是愿意在我完成这本书的漫长时期里仔细聆听并给予鼓励。

目 录

译者序	001
致谢	001
第 1 章 导论	001
政治代表制、疆域和控制权	006
公债的演化和重要性	008
城市国家和领土国家的代表大会	010
地理疆域和商业实力	013
基于大样本的证据	015
城市国家的起源	017
案例研究证据	019
本书计划	023
第 2 章 公债的演进和重要性	027
信贷为什么重要?	027
国家第一次举借长期债务是什么时候	031
举债成本	039
城市国家优势的经济学解释	044

小结	046
第3章 欧洲的代表大会：公元1250—1750年	051
代表大会的起源	052
代表大会的特权	057
谁被代表	064
代表大会的会议召开频率	068
小结	071
第4章 评估城市国家的优势	076
作为均衡结果的政治代表制和信贷	078
政治代表制和公债体系的创建	084
政治代表制和举债成本	091
城市国家内部的差别	097
小结	100
第5章 城市国家的起源	103
罗坎与蒂利的假说	104
加洛林帝国分裂假说	104
经验证据	108
重新评估城市国家的优势	114
小结	117
第6章 三个城市国家的历程	120
科隆的商人寡头政体	121
热那亚和圣乔治银行	126
锡耶纳和九人政权统治	133
小结	138
第7章 三个领土国家的经历	141
法国和统一公债	142

再论卡斯蒂利亚的专制主义	149
解释荷兰金融革命	156
小结	159
第 8 章 对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启示	163
关于战争和国家形成的争论	164
信息、承诺和民主	165
理解早期现代增长	167
参考文献	173

第1章

导论

政治代表制（political representation）概念的产生和公债（public credit）体系的发展，是欧洲国家形成的众多特点中广受关注的两点。政治代表制这种形式是否为欧洲独有确实是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其他地区的统治者的确由委员会或代表大会支持——但是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政治现象或者说这种政治体系，最开始是在欧洲得到了最大程度发展。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当其他地区的统治者还在想方设法地拖延支付商品货款，或者用尽心机地预征税款时，欧洲已经建立和发展了最为广泛的早期公债体系。政治代表制和公债体系的并行发展表明，这两者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因果性的关联。在欧洲内部，被视为政治代表制发展模板的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也可以同时被视为公债体系发展的先驱。但是类似法国的政体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上却显得相对落后了。那么，强化的政治代表制的出现是否促进了前两个国家信贷系统的建立，使这两个国家能够生存，经济得以繁荣呢？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这种强化的政治代表制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呢？政治代表制和公债体系的同步发展又是如何广泛地作用于国家事务中的其他领域，比如战争、国家形成和经济增长的呢？尽管这一问题都非常重要，但是目前尚无对这些

问题的系统而全面的学术研究。本书旨在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我认为，活跃的政治代表制的出现对于帮助欧洲国家获得信贷渠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议会能够监督和修正国家财政支出是这一政治体制的典型特征。但是议会的存在是否真正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还要依赖于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在通信和交通成本很高的时代，强化的政治代表制只有在地理面积非常有限的国家才有可能维持。^[1] 第二，在国家政治中，投资政府债权的商人们也必须在政治精英中有着主导性影响力，只有这种形式的议会才非常有可能采取在政治上与国家债权人（state creditor）利益相一致的行动。以上这两个条件最常在那些所谓城市国家（city-state）被满足。这种满足不是排他性的，也并不是说城市国家的政治生态总是满足这两个条件。在城市国家中，通过最简单的设备，如城镇钟鼓，就可以召集议会。同时，那些购买了公债的商人在城镇议会中也担任着地方行政官的角色。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欧洲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中，地理面积往往被证明是满足上述两个先决条件的一个根本性的障碍。辽阔的疆域使得议员们无法足够频繁地会面，以对公共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在欧洲的领土国家维持政治代表制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领土国家的议会可能具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其影响力更多的时候是以被动的形式展现的，这种被动的形式包括否决国王增税的要求等等。同时，领土国家议会的社会组成也与城市国家的社会组成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作为最频繁地购买政府债券的社会阶层，商人在领土国家的议会中扮演着较为有限的角色，这对政治代表制等一系列体制的运作形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商业利益的盛行就一定能为城市国家带来民主政治。^[2] 显然，本书中所涉及的城市国家没有一个具备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或者古代直接民主制度的全部特征。但是在本书所涉及的城市国家中我们更应该看到，那些在形式上更多地采用寡头政体的国家比那些实行更开明的政治代表制的国家能获得更好的信贷机会。

本书中基于大量样本的统计检验和定性的案例分析说明，商人寡头政体是获得贷款的秘诀。与此相对照的是，当公众迫使城市国家实行更加开明的政体时，也就是说，那些不太可能购买公债的人在市议会中获得了席位，城市国家获得低成本的贷款就变得没有那么确定了。因此一个国家必须作一个取舍：有些政体能够增强国家偿付贷款的能力，但即使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政体本身也不是民主政治；但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阐述的，相对封闭的政体从长期来说更可能会扼杀经济创新。

本书的结论对包括国家形成和经济发展在内的三个学术争论有所启示。第一个学术争论是战争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特别是有种主张认为，随着军事技术的改变，一个政体的最优疆域增大了，城市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变得落伍。第二个争论探讨的是早期现代经济发展的引擎，以及在那期间自由城市是否是创新引擎的问题。第三个争论研究的是代表制或者说民主政治的施行是否有助于解决信用承诺问题（commitment problems）。在本书的结论章节我们将详细地回答这些问题，但在这之前，我们将先简要地介绍每一种争论。

按照一种通常的说法，在涉及战争和国家形成的第一个争论中，冲突是欧洲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论点的一个核心部分是，外部的变化如枪支、大规模步兵和新型要塞等军事技术的发展，意味着需要耗费更多的作战固定成本，这便造成国家的最优疆域也要随着外部的变化而增大。^[3]很多学者还认为战争是一种促使统治者改变政体和官僚体系结构的强有力的动力。^[4]笔者认为，就战争的战略纵深而言，较大的领土疆域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既有利又有弊的。因此，军事技术对于欧洲国家的分布和组织体系的影响可能远比通常学术界所认为的要小很多。随着发动战争所需军队规模的增大，大国因拥有更多的人口而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优势。但是，在军士是被有偿雇佣而不是无偿征召的历史时期，维持庞大的军队规模需要以具有快速流动性的大量资金作为基础。这样，设法获得贷款便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应